

中国社会学课程开设先驱者史实考略

罗国芬

(上海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200093)

摘要:近代中国高校中,社会学属于“舶来”学科。我国社会学史著作中依据许仕廉和孙本文的论述,认为中国高校中最早开设社会学课程的是门·阿瑟(Mr. Arthur Moon)或孟教授(Arthur Monn),时间是1905年或1908年。但经详细考证,结论是:1905年,孟嘉德教士在圣约翰学院开设的社会学课程是近代中国高等学校最早的。

关键词:社会学史;社会学课程;圣约翰学院;门·阿瑟(亚塞·孟);孟嘉德

中图分类号:C 91-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95X(2017)01-0064-05

DOI:10.13256/j.cnki.jusst.sse.2017.01.012

On the History of the Pioneering Courses of Sociology in Chines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Luo Guofen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Chinese sociologists usually believe that in 1905 or in 1908, the course of sociology at the university was initiated by the American professor Arthur Monn in St John University. But this view is not true. In fact, the course of sociology was offered by the American pastor Arthur Mann in St John College in 1905. This is the first course of sociology in Chines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Keywords: History of Chinese sociology; course of sociology; St John College; Arthur Monn; Arthur S. Mann

在近代中国,一门学科得到较快传播和较大发展,与高等学校里设立该专业的系科有着非常大的关系。社会学这门学科在近代中国属于“舶来品”。那么,是谁首先在中国高校开设社会学课程呢?关于这个问题,现今社会学史相关著作中绝大部分论述都存在一些错讹之处。故对相关史实进行考证,以纠偏误。

一、主要观点与资料来源

中国大学中最早开设社会学课程,这个问题涉

及到学科体制中社会学课程的起源,也是这门学科在中国进入制度化传播与建设的重要标志之一。在社会学科重建以来的数十年里,主编或出版过社会学史专著专家是杨雅彬、韩明谟、王康、张琢、袁方、郑杭生和李迎生、阎明、陈新华、姚纯安、刘少杰等人。其中多数学者都对中国社会学课程设立情况做了专门介绍。主要观点见表1。

由表1可见,国内社会学史专著等对中国高校中最早开设社会学课程的史实主要结论大体上可以归入“1908,圣约翰大学,孟教授”及“1905,圣约翰大学,门·阿瑟”两种观点之中。而从数

收稿日期:2014-07-03

基金项目:上海理工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BSQD201506);2016年度上海理工大学教学发展研究基金项目(CFD16013Z)

作者简介:罗国芬(1975-),男,讲师。研究方向:城市社会学、公共政策。E-mail:dxflgf@126.com

量上来看,目前学界更偏向于“1908,圣约翰大学,孟教授”的观点。这些观点出处基本上来源于民国社会学家的两处作品,一处是许仕廉的《中国社会学运动的目标、经过和范围》(1931)一文,另一处是孙本文所撰写的《当代中国社会学》(1948)一书。其中,许仕廉认为:“国内大学中,圣约翰设社会学课程最早。光绪三十一年圣约翰有门·阿瑟先生(Mr. Arthur Moon)担任社会学一科,其教科书为 *Walter Bagehot's Physics and Politics*。”^[14]孙本文则指出,“我国学校中社会学课程的设置,究始于何时何校,尚难确定”,但其最终结论是:“其可考者惟上海圣约翰大学。该校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始设社会学课程,由美人孟教授(Arthur Monn)担任,采用白芝浩的《物理与政治》为教本。”^[15]

表1 社会学史中关于中国大学最早开设社会学课程史实的主要描述

Fig.1 Main views about the pioneer of the opening of sociological courses in Chinese higher schools

主要观点	作者	资料来源
“1908”说	王康 ^[1] ;袁方等 ^[2] ; 陆学艺 ^[3] ;李培林等 ^[4] ; 卢汉龙等 ^[5] ;郑杭生 ^[6]	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1948)
“1905”说	阎明 ^[7] ;王建民 ^[8]	许仕廉,《中国社会学运动的目标经过和范围》(1931)
两说并陈	杨雅彬 ^[9-10] ;张琢 ^[11] ; 郑杭生、李迎生 ^[12] ; 陈新华 ^[13]	许仕廉(1931)和孙本文(1948)等

注:本表中,“1908”说主要是指“1908年在圣约翰大学由阿瑟·孟(Arthur Monn)开设社会学课程”的观点。“1905”说主要是指“1905年在圣约翰大学由孟或在圣约翰学院,由传教士阿瑟·孟开设社会学课程”的观点。“两说并陈”是指相关作者在论述时认为“1908,圣约翰大学,孟教授”和“1905年,门阿瑟,圣约翰大学”这两说难于辨识正误,故而选择把两种可能的情形都列出(但不作进一步结论),或是把1908年开设社会学课程的孟教授和1905年开设社会学课程的门·阿瑟当成两个不同的人来看待。实际上,依据许仕廉(1931)和孙本文(1948)的论述,迄今的社会学史著作中对有个叫“Arthur Monn”的美国人在圣约翰开设过社会学课程这一点是有共识的。但不同的作者把他们所认为的曾在圣约翰开设社会学课程的“Arthur Monn”音译成门·阿瑟、孟、阿瑟·孟、亚塞·孟、孟·阿瑟等多种不同的叫法,难以尽列,所以,本表中依年份的不同主要归纳为“1908说”“1905说”及“两说并陈”等三类观点。这三类观点中,不同作者还可能因人名音译、圣约翰大学或学院的使用等存在细节上的一些差异,因太过琐碎,不再一一列举。本文行文过程中使用的门·阿瑟、孟、阿瑟·孟、亚塞·孟、孟·阿瑟等人名,都源自于相关作者对“Arthur Monn”的不同音译法。出于尊重原著的目的,在直接引用相关文献时,仍照原文列出该人名叫法,下文中不再另加标注。

许仕廉(“1905,圣约翰,门·阿瑟”)和孙本文(“1908,圣约翰大学,孟教授”)的意见不一样,该如何甄别?门·阿瑟和孟教授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们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等等,不少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深究。

二、圣约翰社会学课程开设者的相关史实辨正

(一) 门·阿瑟与孟教授是两个人吗?

圣约翰开设社会学课程的是一人还是两人?社会学界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只有一人,但也有少数著作中认为是两人。

比如,郑杭生、李迎生引用许仕廉《中国社会学运动的目标经过和范围》一文的说法并认为,“此说时间、地点、人物俱全,应当是可信的”。但随后又称,“1908年该校社会学课程改由美国学者亚塞·孟(Arthur Monn)讲授,采用白芝诺的《物理与政治》作为课本”^[12]。很显然,他们是认可1905年门·阿瑟和1908年孟等两人分别讲授社会学课程的。

另外,谷迎春、杨建华主编的《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卷》一书的附录“百年社会学大事记”里指出:“1904年,上海的圣约翰学院(次年改名为圣约翰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由门·阿瑟主讲。1908年由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由美国学者亚塞·孟(Arthur Monn)担任讲授。”^[16]显然这里也是把门·阿瑟和亚塞·孟(Arthur Monn)当作两人来处理的。

张琢在《中国社会和社会学百年史》^[11]一书中也把门·阿瑟和亚塞·孟教授两人并列,应也是把门·阿瑟和亚塞·孟教授当成两个不同的人来对待的。

门·阿瑟、亚塞·孟教授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从开设社会学课程的教师入手,查阅圣约翰大学校史,结果令人惊讶,即在圣约翰校史上,没有叫“门·阿瑟”或亚塞·孟(或孟·阿瑟)的教授,而只有一位叫“孟嘉德”的年轻教师,且他在圣约翰教学仅仅几年(1904—1907),后就因救人而溺水身亡^[17]。

那社会学史著作中的“门·阿瑟”或孟(或亚塞·孟)教授是不是就是“孟嘉德”呢?进一步翻阅圣约翰校史,发现孟嘉德实际上就是中国高

等学校中第一个开设社会学课程的教师。如历史学家熊月之等主编的《圣约翰大学史》就明确提到：“孟嘉德早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1904—1907年在圣约翰大学教授哲学，他是近代第一位将西方社会学介绍到中国的外国学者。”^[18]

可见，中国社会学界在翻译这位美籍圣约翰大学教师名字的时候，是使用音译方法，称之为阿瑟·孟、门·阿瑟或亚塞·孟等等，该教师其实就是孟嘉德。不过，既然“孟嘉德”是该教师唯一的、正式的汉名，因此，有必要尊重主人，摒弃“门·阿瑟”、“亚塞·孟”之类的简单音译，回复“孟嘉德”的正式汉名译法。

（二）中国高校最早开设社会学课程是1908年还是1905年？

圣约翰开设社会学课程最早始于哪年，除了许仕廉提到“1905年”、孙本文提到“1908年”这两个说法之外，还有“1903年”^[19]、“1904年”^[16]等几种说法。有的学者则把孙本文和许仕廉的说法并列（如杨雅彬^[9]、郑杭生等^[12]），但绝大多数社会学史专家都倾向于采用“1908年”这一说法。

那么，各种说法的可靠性如何呢？我们可以根据孟嘉德教士的生平来了解。据圣约翰校史记载，孟嘉德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1904—1907年在圣约翰任教。随后，他于1907年7月因救友人溺水身亡^[17]。据此，可以说，1903年、1908年，孟在圣约翰开设社会学课程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由此可知，许仕廉关于圣约翰最早“1905年”开设社会学课程的说法有其合理性（孟嘉德在1904—1907年任教于此），再对照圣约翰校史资料，可以确认，孟嘉德1905年在圣约翰开设社会学课程^[18]。由于开课时间是1905年，而1906年圣约翰学院才改名为圣约翰大学，因此，孟嘉德1905年开设社会学课程是在圣约翰学院。

另外，社会学史著作中常称孟为教授，但孟是否称得上“教授”？孟嘉德是耶鲁大学1899年毕业生，获学士学位，1904年被派往上海圣约翰书院任教，三年后去世。因此，称“教授”似有些言过其实。实际上，按圣约翰校史称呼“孟嘉德教士”或“孟嘉德牧师”（Priest Arthur Sitgreaves Mann）较为恰当。

（三）圣约翰学院开设的社会学课程是中国高等学校中最早的吗？

在一般社会学史专著及社会学概论教材中，大

部分作者认可孙本文先生的观点，认为圣约翰开设社会学课程的最早时间是1908年，因此对圣约翰开设社会学课程的意义下结论时较为谨慎，不敢明确说出这是近代中国高等学校中最早的，而往往只说是在教会学校中最早的。既然可以确证1905年孟嘉德在圣约翰开设社会学课程，那是否可以说他是近代中国高等学校中最早开设社会学课程的？这还需要做进一步比较。

曾在1916年于北京大学就读过社会学课程的孙本文先生，对国内高等学校开设社会学课程的情况进行过深入考证。孙本文先生从当时教育部所藏京师大学堂旧档中考据早期各学校章程，认为：第一，在光绪三十二年（即1906年）以前，京师大学堂及京师法政学堂课程内，均无“社会学”之名。有之则只是《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国史门及西洋史门随意科所列之“公益学”。第二，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奏定京师法政学堂章程》中，正科政治门第一学年课程表内，有“社会学”二小时^[15]。复旦大学刘豪兴先生可能据此认为京师法政学堂（1906年）“是中国高等学校最早开设社会学课程的”^[20]。不过，孙本文早已明确指出，我国学校中的社会学“此类课程，在当时的京师大学堂及京师法政学堂，是否实际开设，为何人所教，用何课本，有无讲义，一时均无从考见”^[15]。此外，“（京师以外各大学）如上海南洋公学、天津头二等学堂，或亦已设有此项社会学课程，惟均无可考”^[15]。其他如“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在广州长兴学舍中、光绪二十三年（1897）梁启超等在长沙办理时务学堂时设有‘群学’课程”^[15]，据不少学者的意见，尚难称得上是实际开设的社会学课程^[4]。据此可知，孟嘉德1905年在圣约翰学院实际开设的社会学课程，远早于《奏定京师法政学堂章程》中正科政治门第一学年课程表内安排“社会学”（阴历为1906年12月20日，阳历为1907年2月2日）的时间。因此，从目前可以得到的资料来看，孟嘉德可以当之无愧的称为近代中国高校中第一次开设社会学课程的教师。

（四）关于孟嘉德教士的死因

阎明在其社会学史专著中提到孟的死因，称：“1907年，孟为救一位朋友，在广西溺水身亡。为了纪念他，圣约翰大学将一幢学生宿舍楼取名为思孟堂。”^[7]但孟嘉德真是为救人在广西溺水身亡吗？考察原圣约翰大学校园、今华东政法大学校园内关

于“思孟堂”(Si Meng Hall)的铭牌介绍,其中称:“孟氏于1904年到约大任职,教授哲学。1907年7月29日,孟氏在庐山旅游时因营救一个落水的中国朋友而同溺于瀑布中。”这与阎明、陈新华^[13]所说“孟在广西溺水身亡”的看法不一。

那,孟牧师遇难的实情如何呢?据于鹏远的介绍,1907年7月底,“在江西庐山牯岭淹死了两名美国人。一位叫席比义(Warren Seabury),另外一位是为拯救溺水的席比义而同样献出生命的阿瑟·曼(Arthur Mann)”^[21]。于鹏远文中的席比义不但是早期长沙“雅礼大学堂”的主要选址人,而且是第一任校长。而“阿瑟·曼”其实就是圣约翰校史上的孟嘉德,也是社会学史中所谓的“亚塞·孟”或“门·阿瑟”。关于席比义的中英文研究材料较多,席比义的父亲还于1909年出版过关于他儿子的传记*The vision of a short life: a memorial of Warren Bartlett Seabury*,书中老席比义对儿子及救人英雄孟嘉德的遇难经过描述非常详细^[22],该处的说法应该是最为可信的,以往关于孟嘉德“因营救落水的中国朋友而遇难”的说法是以讹传讹的结果,实际上他是为营救同为美国人的席比义而遇难的,而且地点也不是广西,而是江西庐山牯岭。

(五) 孟嘉德的英文名是 Arthur Monn 还是 Arthur Mann?

孟嘉德牧师英文原名到底姓甚名谁?社会学史著作中一般写作 Arthur Monn(包括郑杭生等著的《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一书英文版中也是采用这一英文名)^[23],其源头基本上来自许仕廉1931年的论文。但许仕廉的写法是错误的。

实际上,席比义之父在1909年为儿子所写的传记中对救人英雄孟嘉德是使用“Arthur Mann”^[22],其儿子与当事人存在较密切的关系,成书时间离孟嘉德去世又很近,远早于许仕廉的论文发表时间,因此其权威性应更高。与之佐证的是,与圣约翰大学校史相关的资料都是写成 Mann,比如,今华东政法大学校园内关于“思孟堂”(Si Meng Hall)的铭牌上使用的孟嘉德英文是 Arthur Sitgreaves Mann。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史编辑委员会编的《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外国人名汉译表”中,孟嘉德所对应的英文名为 Mann, Arthur S.^[24]。此外,教会史研究专家林美玫在《追寻差传足迹:美国圣公会在华差传探析(1835—1920)》一书中第223页提到“为纪念执掌校政三年但不幸在牯岭因救友而溺毙的孟嘉德

教士(Arthur S. Mann),筹建思孟堂”,在第314页表格中提到传教士正式汉名“孟嘉德”,其英文原名为 Rev. Arthur S. Mann^[25]。历史学家熊月之等著的《上海的美国文化地图》一书在介绍现今华东政法大学学生宿舍5号楼时提到:“该楼命名为思孟堂,其缘由是纪念孟嘉德(Arthur Sitgreaves Mann)牧师。”^[26]这些材料的出处应该来源于校方档案,也是极具权威性的。由此来看,应该能够确定,孟嘉德的英文名应是“Mann”,而不是“Monn”。

三、结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学史专著及社会学概论教材中关于圣约翰社会学课程的论述其资料基本来源于许仕廉和孙本文,但二人的文稿出版时距课程开设者当事人孟嘉德教士过世已达20余年以上,以致仍存在一些偏误,也影响到后来社会学界的相关论述的准确性。本文从圣约翰大学校史及诸多相关材料考证,得出的结论是:以往社会学史论述中关于1908年亚塞·孟(Arthur S. Monn)在圣约翰开设社会学课程的说法是错误的。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1905年,孟嘉德教士在圣约翰学院开设社会学课程,这是近代中国高等学校中最早开设的社会学课程。孟嘉德教士1907年7月因救人死于江西牯岭。他的英文名应是 Arthur S. Mann。

参考文献:

- [1] 王康. 社会学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66.
- [2] 袁方. 社会学百年[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36.
- [3] 陆学艺. 新中国社会学五十年[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70.
- [4] 李培林,李强,马戎. 社会学与中国社会[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48.46-48.
- [5] 卢汉龙,彭希哲.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7.
- [6] 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精编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2.
- [7] 阎明. 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8.
- [8] 王建民. 人类学学科在中国近代知识建构中的地位 and 作用[M]//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费孝通学术论坛讲谈录:2008—2009.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256.
- [9] 杨雅彬. 中国社会学史[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30.
- [10] 杨雅彬. 近代中国社会学(上)[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 出版社,2001:66.
- [11] 张琢. 中国社会和社会学百年史[M]. 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2:49-50.
- [12] 郑杭生,李迎生. 中国社会学史新编[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66.
- [13] 陈新华. 留美生与中国社会学[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99.
- [14] 许仕廉. 中国社会学运动的目标经过和范围[J]. 社会学刊,1931,2(2):6.
- [15] 孙本文. 当代中国社会学[M]. 上海:胜利出版公司,1948:18-20.
- [16] 谷迎春,杨建华. 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卷[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606.
- [17] 佚名. 圣约翰大学自编校史稿[J]. 档案与史学,1997(1):5-14.
- [18] 熊月之,周武. 圣约翰大学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68.
- [19] 吴增基,吴鹏森,苏振芳. 现代社会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50.
- [20] 刘豪兴. 社会学概论[M]. 第二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62.
- [21] 于鹏远. “雅礼大学堂”的创始人席比义:一位被长沙炎热天气“害死”的美国人[N]. 三湘都市报,2010-11-02(A3).
- [22] Seabury J B. The Vision of a Short Life: A Memorial of Warren Bartlett Seabury,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Yale Mission College in China [M]. Cambridge: Riverside Press, 1909.
- [23] 郑杭生,李迎生. 中国社会学史新编(英文版)[M]. 张春,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02.
- [24] 徐以骅. 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592.
- [25] 林美玫. 追寻差传足迹:美国圣公会在华差传探析(1835—1920)[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23,314.
- [26] 熊月之,徐涛,张生. 上海的美国文化地图[M].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118-119.

(编辑: 巩红晓)

(上接第45页)

四、结论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得出如下结论:

- (1) 女性对标准语的使用度明显高于男性。
- (2) 男性较女性更倾向于在课堂、媒体、银行、超市等公共场合使用方言,但差异不显著。
- (3) 女性较男性更赞同“是否讲标准语会影响别人对自己看法”,但差异不显著。

参考文献:

- 育出版社,2003:178.
- [7] 胡壮麟. 语言学教程[M]. 第三版.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70.
- [8] Fasold R.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Language [M]. Oxford: Wiley-Blackwell Publishers, 1990: 16-89.
- [9] Chambers J K, Trudgill P. Dialectolog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62.
- [10] Romaine S. Variation in language and gender [C] // Holmes J, Meyerhoff M.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Gender. Oxford: Blackwell, 2003: 97-116.
- [11] Trudgill P. Sex, Covert Prestige and Linguistic Change in the Urban British English of Norwich [J]. Language in Society, 1972(1): 179-195.
- [12] Labov W. The Intersection of Sex and Social Class in the Course of Linguistic Change [J].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1990, 2(2): 205-254.
- [13] Spolsky B. Sociolinguistic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 [14] 戴炜栋,何兆熊. 新编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 [15] Lakoff R. You are what you are [C] // Ashton-Jones E, Olson A G, Perry G M. The Gender Reader. Boston: Allyn & Bacon, 1991: 292-298.
- [16] Lakoff R. Language and Women's Place [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5.
- [1] Swann J, Deumert A, Lillis T, et al. A Dictionary of Sociolinguistics [M].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04: 40.
- [2] 胡壮麟,刘润清,李延福. 语言学教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263.
- [3] Coulmas F. Sociolinguistics: The Study of Speakers' Choice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8.
- [4] 王德春. 现代语言学研究[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123.
- [5] 何兆熊,梅德明. 现代语言学[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168-188.
- [6] 梅德明. 现代语言学简明教程[M]. 上海:上海外语教

(编辑: 朱渭波)